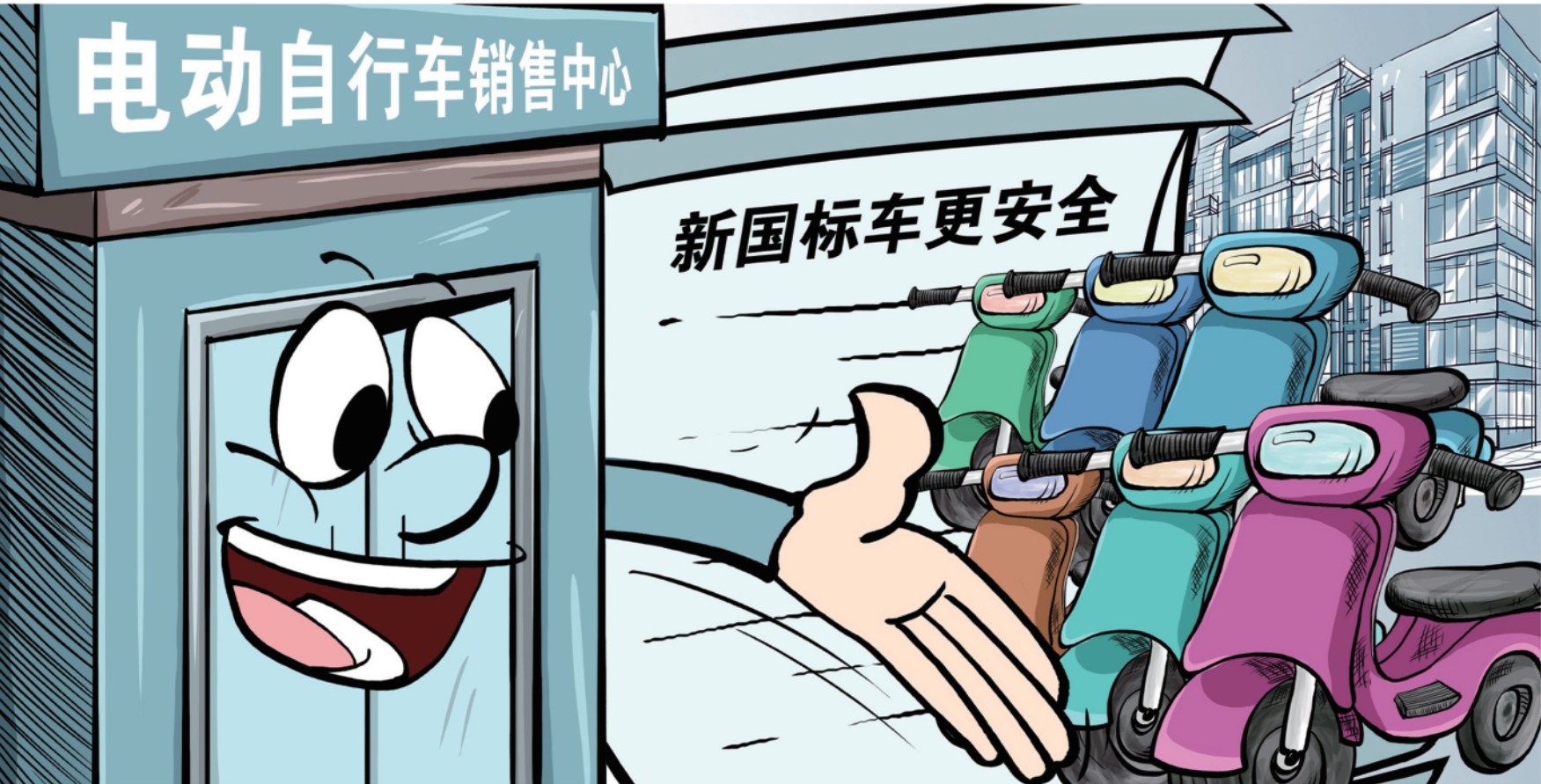




旧国标电动自行车何去何从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见习记者 王宇翔

根据《国家认监委关于严格电动自行车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公告》，自2025年12月1日起，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均必须符合新版强制性国家标准（以下简称新国标），即《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 17761-2024）。这意味着旧国标电动自行车全面停售。

新国标全面实施后，电动自行车销售情况如何？存量旧国标电动自行车如何妥善处理？记者近日展开了调查。

新车上市更加安全

2025年12月18日，记者走访了北京市顺义区、朝阳区近10家电动自行车售卖店铺，以了解新国标过渡期结束后的市场销售情况。

在北京市顺义区一家某品牌电动自行车售卖店里，偌大的店面只摆放着几台新车。

店主介绍，目前门店只有这几台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旧国标车已经全部售罄。在性能上，相比旧国标车，新国标电动自行车进行了升级，增加了北斗导航定位，使用体验更佳；在安全设计上，一车一码有效遏制了非法改装行为的发生。

记者试骑了门店这款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发现车架及踏板均为铁制，座椅比较柔软舒适。

另一位位于朝阳区的电动自行车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2025年11月最后三天卖了40多台车，即便天气寒冷，但还是有好多人来买车。目前门店在售三款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可随时办理过户上牌。

中国自行车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国内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3.8亿台。影响千万人出行的电动自行车推行新国标背后有哪些考量？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向记者介绍，消除火灾事故隐患和降低危害程度是首要的考量。通过减少塑料

件使用，以及强化非金属材料的防火阻燃性能要求，能够起到延缓火灾蔓延速度、降低燃烧强度以及减少火灾时毒气释放。同时，也为了降低交通事故风险。通过严格限制电动机最高转速等关键参数，确保车辆无法超速行驶；缩短车辆制动距离，降低碰撞事故发生风险；鼓励安装后视镜，提高车辆行驶安全性。

在她看来，新国标还能有效防范非法改装。通过完善防篡改技术指标和检测方法，增加互认协同功能，落实“一车一池一充一码”，从技术上大幅提高非法改装门槛，有利于逐步减少乃至杜绝改装行为。

“此外，通过增加北斗定位、通信与动态安全监测功能，方便使用者实时了解电动自行车关键安全信息，一旦发生车辆被盗、蓄电池温度异常或电压过高等情况，可借助通信模块第一时间提醒车主及时处置，从而增强车辆的主动力安全性能。”她说，这样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日常使用需求。通过放宽铅蓄电池车型重量限制，为消费者提供性价比更高、续航里程更长、使用体验更好的产品。

变身“零公里二手车”

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商家将未售出的旧国标电动自行车在11月30日前过户，这样可以在过渡期结束后把这些车当作“二手车”继续销售。

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电动自行车售卖店看到，店铺里摆放了3台用于展示的新国标电动自行车。

当记者询问店铺是否还有旧国标电动自行车时，店员将记者带到店外，指着路边一台电动自行车说：“这台是没有骑过的（旧国标电动自行车），可以写你的名字（指过户），价格比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的零售价高300元，一共5500元。”在后续聊天中，记者了解到这台车是店铺在2025年12月1日前将没有售出的旧国标电动自行车“过户”后留下来的，300元是“过户费用”。

店员说，此前有客户来店购买大部分

“零公里二手车”买走，“他们给钱痛快，也不讲价。”

记者询问是否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店员称没有留下对方联系方式。

新国标全面施行后，是否意味着旧国标电动自行车禁售？销售“零公里二手车”是否合法？

《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慕丽告诉记者，根据《国家认监委关于严格电动自行车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公告》，自2025年12月1日起，未获得新国标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不得销售。该规定属于强制性行政监管要求。

关于“零公里二手车”的法律性质，慕丽说，若车辆在2025年12月1日前已完成注册登记（上牌），则其作为“已登记车辆”，在法律上属于二手车范畴，过户行为本身不违反车辆管理规定。但若商家以“预先上牌、后售新车”方式规避禁售规定，则涉嫌违反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商品真实性质披露的规定，可能构成虚假宣传或欺诈，市场监管部门可依法介入调查。

大量未售出的旧国标电动自行车该如何妥善处理？

慕丽认为，生产企业与销售商应依法承担产品质量主体责任，对库存旧国标电动自行车可采取返厂改造（如符合新国标则申请认证）、拆解回收、出口转销（符合目的地标准）等方式处理。但若商家以“预先上牌、后售新车”等活动，鼓励企业合理回收、折价置换，减少社会资源浪费。

保障旧车维修配件

2025年年初，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2025年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但仍有消费者担心“旧车维修难、配件断供”等问题。

那么，已售出的旧国标电动自行车如何妥善处理？

慕丽认为，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已售出并登记的旧国标车在过渡期内（各地政策不同）仍可正常使用，不应“一刀切”地禁止上路。生产企业与销售商应依法履行“三包”责任，保障在合理期限内供应维修配件。市场监管部门可加强对配件市场的监管，打击非法改装，保障合规配件流通。建议建立“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全链条责任体系，推动企业参与废旧车辆回收，实现环保化、资源化处置。

“长期而言，当车辆老化时应主要通过以旧换新等渠道引导车辆安全、环保地退出。”郑翔补充道。

新国标已经颁布，如何推动其落地亟须提上日程。

郑翔建议，应加强新国标宣传，突出其安全性。同时应进一步完善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的适用场景，例如在保证安全（防火、防篡改）的前提下，可评估对载人、储物等合理需求的参数，进行更精细化的分类管理。

在她看来，电动自行车生产商也需优化产品设计，适配多元场景需求。例如推动行业将后座、后视镜、充足的脚踏空间、安全车灯等涉及基本安全和实用的配置，作为主流车型的出厂标配，而非需要加价的选择配置。鼓励企业研发针对“亲子接送”“购物载物”“长途通勤”等不同场景的差异化车型，通过设计创新（如可折叠后座、前置储物篮）在合规框架内满足需求。在满足防火阻燃要求的前提下，选择性价比更高的材料，降低制造成本。例如，采用高密度阻燃发泡材料替代部分金属部件，兼顾安全性与舒适性。

“还要加强市场监管，严查借新国标之名恶意涨价的行为，加强对企业生产资质的审核，打击违规生产、销售行为。打击非法改装网点，切断风险源头，保护选择合规产品的消费者。同时，鼓励商家或金融机构提供低息分期付款方案，减轻消费者购车资金压力。”郑翔说道。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丁一

晚上，随着清脆的消息提示音，居住在山东省济南市的王女士手机响起——那是上小学四年级的孩子所在班级群有了新消息，老师发来一份需要打印的数学专项练习——两页A4纸，要求次日早上交。王女士抓起电动自行车钥匙，匆匆下楼，赶往最近的打印店。

这样的场景，近年来在她家已经多次上演。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家长和王女士一样，都有夜间“紧急打印”的经历，班级微信群中随时弹出的作业文件，成为许多家庭的常态“任务”。

打印作业给家长带来了怎样的现实负担？其背后又折射出当前教育实践中的哪些矛盾？《法治日报》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采访。

打印作业成为家长负担

“平均每周打印3次至5次作业，不是练习卷就是复习资料。”王女士告诉记者。

“有时我比较忙没有注意到群消息，有时老师发打印作业时间比较晚，导致无法及时给孩子打印，因为打印店关门了。”王女士说，这种“深夜打印难”的窘境，让家里陷入忙乱和焦虑。

王女士尝试与老师沟通。“有一次，我向语文老师反映打印作业多，却收到‘愿意做就打印，不愿意做就不做’的回复。”

这样的回应让王女士倍感无力。

宗女士居住在山东省枣庄市，孩子今年上初中二年级，同样有这类烦恼。

采访中，她向记者回忆孩子就读初一时的情景，“打印任务繁重，工作日每天打印两张，周末每天打印五六张。一学期结束，我把孩子的打印作业整理后搬起来测量厚度，在大部分打印作业上交给老师的情况下，家里保存的练习纸近0.1米高。如果估算，孩子一学期打印出来的作业高度可能超过0.2米。”

“家里没有打印机，每次打印都像在执行紧急任务。”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的朱女士这样描述。她坦言，寻找打印店、往返路程、排队等待，整个流程往往需要耗费半小时以上。

宗女士介绍说，打印作业内容以语文、英语为主，多为老师临时布置的练习卷、复习资料或默写纸。尽管老师常说“有条件的家长可以打印出来”，但大部分家长会选择打印，有的作业内容没有办法用手抄，必须打印，比如函数图像、几何图形。

“这已经成为我们家的负担。”王女士说。首先是看得见的经济账，打印一次两三元，一学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与经济压力相比，精神负担更重。对王女士来说，帮孩子打印作业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及时查看班级群、课程群已成为“习惯”，这些都是时间和精力消耗。

尽管深感不便，但家长们普遍选择沉默。

“我没有向学校或老师反映打印作业过多的问题。”朱女士告诉记者，主要原因是内心有所顾虑，担心反馈之后，老师认为家长“事多”，反而对孩子不利。

“如果反映打印作业过多，老师可能觉得家长不想让孩子写作业。”宗女士道出了她的顾虑。在“一切为了孩子学习”的前提下，任何对作业的质疑都可能被误解为“不配合”学校教育，影响的可能是孩子的成绩。这种沉默，让问题始终被局限在家庭内部，难以得到校方的正视和解决。

学校教学责任转嫁家长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要求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

受访专家认为，老师频繁在微信群中布置需家长自行打印的作业，这一行为本身与“双减”政策精神相悖。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分析，过度依赖家庭打印作业，实质上将家庭异化为学校教学任务的“执行末端”，模糊了家校间的责任边界。一方面，规避对学校作业量的监管，导致学生作业任务“明减暗增”；另一方面，增加家长负担，将本属于学校的责任转嫁给家长。“双减”政策要求“教师要指导小学生在校内完成书面作业，初中生在校园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家长需要引导完成“剩余书面作业”，而非作为指导学生完成作业的主力。

“让家长打印作业成为学生完成作业的强制性、常态化前置程序，本质上是将学校教学保障责任转嫁给家长。”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教育法治研究基地研究员刘一玮说。

她认为，这种现象折射出当前教育生态的深层矛盾，即家校共育责任边界模糊。包括打印作业等在内的本应由教师承担的教学管理职责转嫁给家长，家校共育异化为“家校共教”，家长甚至成为“校外教师”角色。

刘一玮认为，这一现象背后，政策执行异化，政策稳定性不强是重要原因。

“‘双减’政策的本意是推动学校与教师优化作业质量，合理控制总量，但让家长自行打印作业，是政策落地执行的异化。同时，‘双减’政策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本质上仍属于教育政策文件范畴，其稳定性不及国家法律法规。”她说。

在姚金菊看来，“双减”政策落实难，主要面临两个困境：一方面，政策与法律的衔接存在问题，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于保障休息权的规定，教育法、义务教育法中也有保障平等受教育权的规定，但“双减”政策缺乏与上位法的衔接；另一方面，教育部“的执法资源有限，监管技术不足，导致学校或老师可以通过相对“隐蔽”的途径规避对作业总量的监管，导致对“双减”政策落地的监督难以常态化。

违规布置作业可以问责

受访专家认为，治理此类问题，需要将教育减负纳入法治轨道。

在姚金菊看来，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中关于教育减负的规定，是“双减”法治化的起点；通过部门规章等指引学校对“减负”进行制度化构建，将“双减”政策落实为学校规章制度；在执行层面，加强教育评估和监督，可以考虑纳入教育督导评估体系。

“应依法明确教育参与各方主体的法律责任，加大行政执法力度，配置足够专职执法人员，对于违规布置打印作业等行为进行查处。落实问责机制，对违规布置打印作业、变相增加学生负担的学校，依法给予通报批评、经费核减等处罚。”刘一玮说。

姚金菊建议，教育应回归服务学生发展的本质。她认为，教学创新与减负相辅相成，提高教学质量、精进教学研究，打造高效的课堂，让学生可以在课堂上完成对大部分知识的掌握；丰富学生考核方式，允许教师在资源库内或经备案后，合理选用、组合或微调习题，让补充练习“名正言顺”。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进一步对作业类型（如预习、练习、探究、阅读）提出比例指导。

刘一玮建议建设共享作业库。开发高质量基础性作业、拓展性作业，丰富不同层级作业形式，如探究式作业等；推广线上作业系统，可以实现分层、弹性和个性化推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教师负担，提升学生学习质量。

“教师可以选择学校统一打印或订购统一习题册等方式，由学校教研室完成，避免将此环节留给家长和学生个人。要明确发布渠道与格式规范，通过官方指定教学平台统一发布，如需电子材料，应提前打包，一次提供，严禁零散、临时的群消息刷屏。”姚金菊说。



深化“法育青蓝”行动 创新“一市一品”品牌

浙江构建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宣传教育新格局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詹杭 吕佳慧

2025年年底，在浙江省义乌市分水塘村，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陈望道的故居里，一群身着红色校服的孩子围在玻璃展柜前，凝视着泛黄的手稿与旧书。展墙上，陈望道授课、调研、发言的影像定格岁月，天窗透进的阳光照亮了孩子们的眼眸。

这是浙江省司法厅联合浙江省教育厅创新打造的2025年“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感悟法治力量”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宣传教育主题实践活动的一个生动缩影。

浙江以“法育青蓝”系列活动为抓手，创新推出“一市一品”工作品牌，通过多部门协同联动、沉浸式普法体验、精准化服务供给，构建起党政机关、学校、社会、家庭共同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宣传教育大格局，全方位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法治屏障。2025年以来，全省累计开展相关法治宣传教育活动1.3万余场。

统筹构建全域普法网络

在绍兴市新昌县红色司法开拓者梁柏台生平事迹陈列馆感悟宪法精神，在丽水市莲都区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聆听法治故事，在温州瑞安市国旗教育馆肃立行礼，在嘉

兴市南湖景区湖心岛上诵读“红船精神”，在湖州市安吉县余村体悟“两山”理念中的法治内涵……

沿着浙江“六地六线”法治研学线路，各地司法行政机关与教育部门联动开展“法育青蓝”主题实践活动，让青少年在红色足迹中浸润法治素养，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2025年以来，浙江印发《2025年“法育青蓝”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宣传教育系列活动工作方案》，以“法治班课”“模拟法庭”“校园辩论赛”“AI+普法”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普法工作精准落地。

2025年暑假期间，结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部署，全省在电影院、大型综合体、培训机构、青少年宫等场所开展主题普法活动5700余场次；第十届全省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持续深化，“法治青年说”“宪法卫士”等系列活动层层推进，形成“校校有活动、人人皆参与”的良好氛围。

浙江省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处长杨建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我们积极贯彻落实法治宣传教育法、《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深化“法育青蓝”行动，坚持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和文化熏陶相结合，充分发挥法治宣传教育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

通过系统谋划，全域推进，浙江正持续提升未成年人规则意识与守法能力。

打造特色普法品牌矩阵

“钱塘江畔学宪法、法治盲盒藏知识”——杭州市以钱塘江法治文化带为核心，整合沿江法治驿站资源，打造“尚法·童”行”研学高地，拉开浙江“一市一品”普法品牌建设序幕。

宁波市构建“三维”青少年法治教育体系，培育35个校园法治品牌；温州市以“融合共治”推进未成年人法治教育，高校联盟举办“高校法治辩论赛”等活动36场次；湖州市建省内最大未成年人道德法治体验馆，编印“两山”思想地方教材；嘉兴市举办“关爱有嘉，法治润苗”微视频征集活动；绍兴市构建“五位一体”法治宣传教育新格局；金华市聚焦校园欺凌、网络安全开展“青春护航”体验活动；衢州推广“学生法庭”经验；舟山市融合海岛文化打造“海娃学法”品牌；台州市建立税收法治教育联动机制；丽水市组建“法治班主任”师资库……

如今11个地市立足地域特色，聚焦青少年需求，各展所长打造个性化普法品牌，形成覆盖全面、特色鲜明的普法矩阵，让法治理念浸润人心。

聚焦特殊群体精准普法

“法律保护每个孩子的尊严。”在泰顺县

一所山区学校的沉浸式防欺凌课堂上，法治副校长陈慧慧通过情景扮演、弹幕答题等互动形式，让未成年人保护法条款转化为学生易懂的行为准则。

近年来，针对留守儿童监护缺失、村落分散等痛点，泰顺县司法局组建60支“法律明白人”家庭导师队伍，走村入户开展权益保护宣讲，同时通过“慧说法”短视频账号，以动画剧集形式普及防范校园欺凌、平等尊重等法律知识，让法治温暖浸润山区“末梢”。

这一实践是浙江聚焦特殊群体开展精准普法的生动写照。

2025年8月，浙江省司法厅联合浙江省委网信办、省教育厅等部门，在淳安县举办“法育青蓝”系列启动启动仪式暨“法治润童心”农村留守儿童专项普法活动。

活动现场，毒品预防法治微课、歌曲合唱等环节传递法治关怀，辐射带动全省各地针对留守儿童儿童、困境儿童等群体开展靶向普法，通过“法治副校长+校园公益法律顾问”双重保障，线上线下多元渠道，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起无死角的法治防线。

从红色研学线路到特色品牌矩阵，从普适性宣传到精准化关爱，浙江正以系统化思维、创新性举措持续深化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让法治精神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厚植法治土壤。